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43期

2010年3月10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三十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缉思 唐士其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愈发离不开世界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当国内学者总结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我们在博源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完成了《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研究课题。该项目的13个分报告，分别回顾了东南亚、中亚、东欧、中东、非洲、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历程。作者绝大部分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员。在分报告基础上，我们撰写了一篇总报告。本文是总报告的结论部分，试图归纳三十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

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化与公民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而独裁与专制政体已经为世界人民所普遍抛弃。1970年代时，采用多党普选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而到1990年代后期已经占绝大多数。今天，即使像缅甸、伊朗这样一些被西方认为是独裁专制的国家，也在表面上维持着多党政治或普选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金融危机或一些社会危机，以至于像美国2000年总统选举计票争执那样的政治纷争，也没有造成对政治体



制的根本冲击，更没有向法西斯式的独裁转型的可能。

从长远来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的势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化的扎根趋势更为明显。但是，历史上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国家都普遍缺乏稳定性和健全的法治。伊斯兰国家中至今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亚国家在短时间内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保留着西方文化传统的中东欧国家却能很快适应多党民主，说明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事实证明，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二）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异的诉求和特色。

发达国家的传统民主制显现出一些缺陷和弊端，比如少数人的权益在“竞争性多数决”制度下遭受牺牲，于是“共识民主”和“慎议民主”应运而生。西方国家也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舆论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种种改革。精英阶层对民主制度能否高效应对跨国挑战和金融危机表示忧虑。

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对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探索不应过多指责，而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宽容。

在冷战格局之下，美国与苏联分别向其“卫星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强加了诸多与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制度因素。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人民“试错”努力的意义。

（三）在公民自由和民主制度之外，稳定、秩序与社会公正也是各国政治所追求的目标。

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与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



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在刺激人的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恶果。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幅度。在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往成为超越法制的强权表达，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为社会公正提供完整的答案。

（四）在国家同社会、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但尚未产生能真正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

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曾被认为代表着普世价值；但过去十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迷信遭到普遍怀疑和否定。人们认识到，过度的国家干预抑或全面的国家控制固然是社会的灾难，但彻底的自由放任却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紊乱。但是，如何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寻找一种合适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在每个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均在急剧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动荡、社会分裂，都呼唤政府起到克制贪欲、维护公正的社会平衡器作用。但是，如果政府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过程不透明，其权力越大，社会失衡就越严重。“第三条道路”难以找到实质的精神内涵与政策支撑，原因即在于此。

随着冷战终结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的强力推动。西方国家政府与跨国公司相互合作，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同跨国公司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真、电脑、互联网、手机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了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加深了社会的精神危机。由于“世界政府”不可能出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由亲资本、亲垄断利益集团的政府所领导，横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尽管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未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

20世纪初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思想，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远大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在21世纪初如同空谷足音。以推翻邪恶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为表面目标的零星暴力活动，被贴上“恐怖主义”



的标签，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所谓“反全球化运动”，亦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后盾、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乌合之众所推动。针对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目前受制于政府间静悄悄的合作、竞争与交易，而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五）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在全球范围内，和平、环境、人权等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分量，成为每一个国家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之同步的，是国家之外的新的社会认同，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软性的、国家以外的社会认同。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和公民效忠对象，但仔细考察世界政治史和思想史便不难发现，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永恒。

三十年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伟人并不多见，而能领风骚于一时的思想家更是屈指可数。冷战刚刚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意指自由主义已经一统天下，今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再会有关于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即意识形态的争论。萨缪尔·亨廷顿则断言，以宗教界定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冲突，将取代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冲突，成为世界政治的主线。他们提出的观点的偏颇之处不难指出，其谬误亦已为近二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批判家却一直未能提出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甚至未能竖立起产生类似影响的新靶子。我们只能说，“普遍同质国家”不会出现，而“文明的冲突”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题。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而今日西方也不再能够为人类展示一种更为光明的发展前景，因此也就无法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新兴国家点燃了新希望，但既是“新兴”，一切皆只在探索阶段，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在这一意义上，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除了展示世界政治的“同一化与多元化并存”之外，我们也只能说，新的世界历史也许才刚刚开始。

编辑：侯颖丽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电话：86-10-62756530

邮编：100871
传真：86-10-62759302